



渠敬东 主编

现代社会思想论丛

陶云逵 著

杨清媚 编

车里摆夷之生命环

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海外借



现代社会思想论丛

渠敬东 主编

车里摆夷之生命环

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

陶云逵 著

杨清媚 编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车里摆夷之生命环：陶云逵历史人类学文选 / 陶云逵著，杨清媚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
(现代社会思想论丛)
ISBN 978-7-108-05625-2

I. ①车… II. ①陶… III. ①民族学—文集 IV. ①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0578 号



本书出版由亚际书院资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冯金红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4

字 数 320 千字 图 40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5.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总 序

中国人的现代思想之路走得很艰难。当一种文明处于危亡之时，有志之士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有识之人则常感一切运化未明，不可妄断。当一种文明处于再生之际，则必须将外来的新思想、新情势会通于自身文明的本源和历史之中，陈寅恪先生所言“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乃是最恰切的体现。此间所谓的道器之争、体用之辨，便是其中的艰难所在。

然现代学术之变，终不离中国文明之根本。清末以来虽新学迭出，思想的底色依然是靠经学和史学两个面向来铺展的。先是廖平、康有为取今文经学的路子托古改制，重启公羊三世之说，掀起一番经学革命，将进化之道融于大同说中。后有章太炎拨乱反正，以史为宗，谓《春秋》为史家之实录而非万事之圣经，而铸古文经学为史学，以文史续传民族命脉。严复则应“世变之亟”，鼓呼“群学”，将“善群者”的培育作为通向中国现代道路的起点，并秉承玄奘之志，致力于中西转译和会通的事业。如此等等，说明无经史之变，当无现代学术之变，无对于中国文明本源和历史的诠释与重构，单凭一味的移植或应激反应，便无文明传续和再生的基础。

由此看来，中国现代思想的开与合，不仅是一种采纳学问新法的过程，更是一种自身文明之反省和回归的过程。王国维借充足理由律来疏解新材料，探究殷周制度变革，求的是上古史变与经本的关系，强调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制度精神所在。陈寅恪广泛使用考订参证之

法，考察中古史胡汉杂糅、民族混融的历史局面，乃是要以文化而非种族来论中国，期望确立一个文化绵续的新时代。史学的更新，一时间可谓百家争鸣，既催生了对于理解中国文明的通观视角，也通过新的观念、方法和材料重新厘定了历史变迁中的关键议题。

而新兴的社会、经济、法律等诸学科，倡导的亦是“中国化”的思想取径，不仅守持着文明结构中的元问题，且牢牢地把握着现代变迁背景下古今续接中的实质性难题。譬如，经济史有关永佃制和包买制的讨论，并未一味地迎合现代权利理论，而是将中国历史与现实特有的土地关系和社会连带所产生的经济效果呈现出来。“亲属法”论辩，则是在礼法之争的大背景下，将问题的焦点锁定个体本位之现代法律体系与家族本位之传统宗法制度间的张力。即便陶孟和用最新的社会调查手段，针对最新的工人阶级所做的研究，也是通过记账法的方式将研究客体落实在家庭而非个体上。更何况潘光旦用优生学原理，来考察家族世系中的位育问题；杨开道虽倡导农村自治，承接的却是吕氏乡约传统以及朱子加以增损的义理；费孝通所论双轨政治中的皇权与绅权，将焦点放在了基层社会治理中中国所独有的教化面向上。凡此种种，印证的正是现代学术变迁中始终贯彻的一种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的自醒，靠闭目塞听、唯我独尊是做不到的。王观堂先生曾云：“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钱宾四先生在谈及佛教东传的历史时也说过：“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掺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当一种文明面临着动荡、转化和再生之处境，士人的心志和胸襟是最重要的，这既是智识上的考验，更是情感上的考验。我们若不

能从现代学人那里寻得学问上的缅怀与亲情，何谈更为宽厚持久的文化担当？

中国人向来以父母的生养和血脉的传承为重，可生身的情境易懂，学问的根脉却难明。百余年来现代中国的学术，是文明激荡和混融的产物，前辈学人有如我们学问上的父母，中国人面临的种种现代难题，他们体验过，思考过，省察过，也探寻过新的出路。他们一路走来坎坷而艰辛，忍着伤感、痛苦及难料的时运，采食四处，含辛茹苦，做的都是知识培育和精神生养的努力。且无论此种积淀和建树究竟到何种程度，都是我们这些学问后生必须予以珍视和敬重的。今人耽于健忘的沉痾久矣，常常扮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样子，视往学于不顾，犹如江湖一般。不知父母，哪来斯文？不知先祖，哪来尊仰？不知学问的谱系，哪能认清自己的位置？不知自己的位置，哪能生发出恰切的情感与责任？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回归我们自身文明的传统，并在现实经验之中体会到她的好，是今天人文和社会科学要做的双重工作。对于任何一种文明传统，回归即是重塑和再造，要不断追溯其经学理据，考辨制度与精神的基本格局，又要不断研别历史演变的过程，抓住上古、中世以及近代这些关键性的历史环节；要守持一种文明本位和文化自觉的方向，又要保持一种文明开放的视角，将中土与边疆多元一体之共存格局、原生文明与外来文化之相互交融，理解为文明的本源性议题；要把我们的文明理解为面向未来的普遍历史进程，又要恰当准确地把握现实世界的发展情势……所有这些，皆意味着我们的文明依然处在一个亡与存、衰与兴的关口当中，承古知今、推故见新，重建我们自身文明的价值系统，是吾辈学人必须承担的使命。

我们曾经的历史说明，人若学问上无父无母，必成为精神上的孤儿，这也必是一种文明的衰兆。今日学术之兴，必须首先重拾对于前代学人的父子情识，重返经史学问中的文明本题，续写出一种我们自

身血脉中的思想传统，方能担负起对于后代学人的生养天责。

中国学术的现代变局，堪比战国、两汉与唐宋，此间众说纷起，各派纷争，却也埋设了各种通往未来之建设可能的学识和洞见，亟待考证辨析。丛书选取了一些在诸多学科中有开创性的思想文献，在付梓重版的同时，又分请新一代学人撰写长篇导论，重新梳理和分殊现代学术的谱系，并与之展开充分的思想对话，以期将中国现代学术变迁之视野、路向和种种难题重现出来，为今人所鉴。

是为序。

渠敬东

2015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导 读

文化与民族精神

陶云逵及其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遗产解读 杨清媚 1

历史与民族志研究

华欧混合血种——一个人类遗传学的研究 65

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 113

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 143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 159

车里摆夷之生命环 179

徐 序 181

自 序 183

第一章 摆夷之名称及其现代之分布 185

第二章 车里摆夷之家庭与阶级 189

第三章 车里宣慰使司之政治制度 193

第四章 婚姻制度与婚嫁仪式 208

第五章 家庭生活 229

第六章 生产习俗与教育制度 250

第七章 公共生活与娱乐 269

第八章 丧葬 283

16 世纪车里宣慰使司与缅王室之礼聘往还 289

几个云南藏缅语系土族的创世故事 297

文化理论及其应用

文化的本质 313

文化的属性 318

个人在文化中的参与 326

《西南边疆社会》绪言 330

社会与文化之性质及其研究方法 334

论边政人员专门训练之必需 343

书信

邢公畹致冯文潜函（1942 年 5 月） 355

邢公畹致冯文潜函（1942 年 6 月） 358

陶云逵致冯文潜函（1942 年 7 月） 359

陶云逵致冯文潜函（1942 年 8 月） 360

黎国彬致陶云逵函（1942 年 8 月） 364

黎国彬致陶云逵函（1942 年 8 月） 365

杨成志致陶云逵函（1943 年 9 月） 367

陈梦家致陶云逵函（1943 年 9 月） 368

吴定良致罗常培函（1944 年 2 月） 369

附录一 陶云逵生平 370

附录二 陶云逵论著目录 375

导读 文化与民族精神

陶云逵及其作为“精神科学”的人类学遗产解读

杨清媚

本书所要介绍的人类学家陶云逵，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科学界而言是相当陌生的。尽管陶云逵曾是中国首位以“历史人类学”头衔受聘的教授，但是和大多数已经被遗忘的名字一样，他曾经给 1940 年代中国学界带来的震撼，几乎没留下些微涟漪。重新“发现”陶云逵的理由，在于他是第一位用“文化”理论来做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他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提出过精彩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仅是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我们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通过陶云逵对“文化”的理解和运用，我们将重新思考“文化”在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对社会科学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探讨。

随着近年来对中国社会科学西学传统的整理工作的开展，陶云逵作为德国民族学在中国的传人也偶尔会被人们提起，但是大多数时候只是作为民国社会科学的一个背景知识，从未得到正眼相待。直到 2004 年南开大学为迎接八十五周年校庆，其校史研究室着手整理尘封已久的档案，这才在边疆人文研究室的珍贵资料里发现了陶云逵的文章和书信。这批材料不仅首次呈现了陶云逵研究令人惊异的前沿性和独特性，也披露了他与“中研院”史语所同人的密切往来。整理者之一梁吉生在《陶云逵先生边疆人文研究的一生》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叙写了陶云逵的生平，尝试恢复这位生前被称为“云南通”的学者昔日的光彩。

2012年李东晔女士整理出版了《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辛勤收集了陶云逵大部分作品。文集立意求全，以陶云逵的人生史为线索，将其短暂的学术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1）1927—1933年，在欧洲求学，做体质人类学研究；（2）1934—1936年，在云南进行民族志调查；（3）1937—1944年去世，以边疆人文研究室为工作重心，集中在文化理论与边政学。这条线索更为清楚地勾勒了陶云逵的学术面貌。多亏有这些基础，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深入陶云逵的思想世界，走近那个内忧外患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

但也正是这些整理工作暴露了我们对陶云逵及其学统的理解，仍旧存在某种程度的误解。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最早对陶云逵进行回顾和评述的文章应溯至1980年代，陈永龄和王晓义先生所作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一文。他们根据国别传统梳理了中国早期民族学人类学中的主要流派，明确提出其中存在过“德奥传播论学派”与进化论、英国功能主义和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等并立，而它在中国的传人就是陶云逵。^{〔1〕}陈、王两位先生指出陶云逵的研究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运用文化和历史结合的观点来考察云南民族；二是民族志偏向古典人类学的风格，也即热衷一种“文化百衲衣”式的描写；三是有概括文化理论的抱负，并主张将之运用到边疆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也即对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有所关注。同时，也对陶云逵提出了批评，认为陶云逵的文化理论运用的实际结果，是推动民族同化的大民族主义，因而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设计”。^{〔2〕}

陈、王两位先生的批评确可视为“二战”以来国际学界对德国文化观与历史主义的通常质疑。这些质疑大多针对的是作为文化核心的

〔1〕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载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学研究》第一辑，276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2〕 同上书，276—278页。

“volksgeist”（通常译为“民族精神”）会导致民族主义，其根源在于“民族精神”被视为一种恒定的存在，不可以被历史所消解，并且一旦与国家结合，就会导致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极端条件下将产生无限扩张的欲望和暴力。^{〔1〕}

或许受此影响，李东晔在其“导读”中才会回应，对强大国家和民族的渴望其实是当时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并且陶云逵的文化理论支持了他的边政学思想，因为文化的内核与外层的互动，使我们可以通过促成文化的变迁来达成边疆社会的改造。^{〔2〕}这个看法虽然想要维护陶云逵，但实际上延续了陈、王两位先生的批评。

若真如此，陶云逵的文化理论及其实地研究确实不值得我们一再提起。然而这个批评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尽管陶云逵对边政建设有许多积极的设想，他却一直坚持文化与国家相互疏离；他恰恰反对国家以自己的意志去强力改造边疆社会，也不认为知识分子能够直接参与社会改造的工作，反而强调应该培养专门的边政工作人员，由他们来谨慎地推动地方社会的现代化适应过程——这些人员应对地方社会有充分的了解，或者本身就出自地方社会。^{〔3〕}

这种文化与国家疏离的观点，揭示了陶云逵的文化观来源并不是黑格尔主义。这需要回到“民族精神”一词的源头来说。

“Volksgeist”这个词被认为是由18世纪来自东普鲁士的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正式确立下来并率先使用的。^{〔4〕}虽然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就已经存在一种谈论民族精神、国家精神和其他实体的精神的倾向，后来在伏尔泰那里，“精神”（esprit，或génie）首次与历史思想的解释放在一起，由此创生了“历史哲学”这

〔1〕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323—32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2〕 李东晔：“导读”，见其编《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5—14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3〕 陶云逵：《云南土著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见《陶云逵民族研究文集》，103页。

〔4〕 Isaiah Berlin, *Vico and Herder: Two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6, p.145.

一词；但是，使“民族精神”脱离一种外在的、仅仅与统治者的历史相关联的方式，而成为文化整体内在价值观的人，却是赫尔德。^{〔1〕}其后，黑格尔哲学进一步将原本分开的民族精神与国家精神合成一个，其背后是18世纪德国长期分裂的状态所产生的对国家根源合法性的焦虑，所导出的对普鲁士精神如何成就统一的德国这个问题的思考。这一影响在史学界从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后期开始，到兰克（Leopold von Ranke），成为德国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一。^{〔2〕}

正如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国家的神话》一书中指出，黑格尔把“国家”视为最高的存在、最普遍的真、最完善的实在，这是之前的政治理论从未出现过的。黑格尔甚至首次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即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民族，是世界精神的代表，这个民族有权统治一切其他的民族；这就为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做了准备。^{〔3〕}卡西尔也谈到，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与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理论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在体现了国家的客观精神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的阶段，它不应压制其他的精神力量，而是承认它们、给它们以自由，完全显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差异性，这其实是个体主义的极度发达。^{〔4〕}

也就是说，民族精神并不是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作为文化的内核，它有自己的神话依据并以之为追求，通常会演变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国家也有自己的神话来源，最初正像卡西尔所说的那样，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获得独立的政治意义，因此是从政治学而非希腊人的自然观念来重新理解“人”，这也奠定了国家理性学说的基点。^{〔5〕}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结果，则是支持“国家”占有了

〔1〕 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85—90、34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2〕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86、10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3〕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333页。

〔4〕 同上书，335—336页。

〔5〕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74页。

民族精神的神话源头，这才导致“民族精神”一词的衰败。

陶云逵对文化的理解在概念源头上更接近赫尔德。陈永龄和王晓义先生等人的批评其实没有看到陶云逵的讨论不是从黑格尔之后的民族国家概念出发，而是以文化为出发点的。

虽然陶云逵的文化理论是在 1940 年代前后才被完整地总结表达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他对这些问题没有思考。事实上从博士论文研究阶段开始，他就已经有意识选择从文化来解释基因遗传。回国后进入云南进行田野调查，陶云逵一开始的精力主要放在云南区域的文化与历史研究，从地理和族群的垂直分布情况发现并构拟这个文化区的历史层叠。很快，这样一种文化概貌的描述已不能令他满足，他希望进入文化内部去了解观念体系自身发生的变化，及其与具体社会的关系。最直接入手点是宗教和神话。因此到 1942 年人文研究室成立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去考察大寨黑夷的图腾制，继而重新整理车里摆夷的材料。他在突然因病去世前，正在搜集云南诸语族的神话。

可以说，陶云逵是将文化作为研究工具而不是当做本质问题来讨论的。随着经验材料的拓展，他才将之进行理论化，并以之为基础展开应用研究。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边政学迟至 1940 年代才有集中讨论的原因——如果没有田野经验带来的现实冲击和相应的研究积累，陶云逵不会在吴文藻和傅斯年之间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值得指出的是，近些年来人类学界出现了对德国文化理论的重估，实际重新承认其作为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如美国人类学史专家斯托金（George Stocking）通过博厄斯（Franz Boas，又译波亚士）及其第一代弟子的作品研究试图呈现“volksgeist”在洪堡和费舍尔（Eugen Fischer，又译费适）等不同脉络中的理解和影响。^[1]其中，费舍尔正是陶云逵的

[1] George Stocking (ed.) *Volksgeist as Method and Ethic: Essays on Boasian Ethnography and the Germ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6.

博士导师。因此，对于陶云逵的人类学研究进行再研究，本身亦是对20世纪早期中国人类学及其西学源流的多样性加以呈现。关于这段学术史，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陶云逵留下的学术作品可以粗略分为三部分：民族志、文化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应用研究——边政学。因此本书在进行选编的时候呼应这三个部分，遴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由于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以后，陶云逵进入学术高峰期，研究风格更为鲜明、突出，我们也将选入这一时期他与研究室同人、史语所同人的来往信件作为补充。这些信件涉及学术和生活上的事情，能使读者形成更生动的认识。这部分材料得益于南开大学校史室，他们在尘封的角落里发现了这些珍贵的书信并翻译出版，于学界功莫大焉！

一 陶云逵的人生与学术

1904年，陶云逵出生在江苏武进。其父陶瑢（1872—1927），原名璐，字宝如，号剑泉，曾任河南临颖知县，辛亥革命后流寓京津，曾任财政部秘书。^{〔1〕}陶宝如性耽书、画，兼工铁笔，尤善画松，在当时亦颇有名气。因有这个家学的关系，费孝通曾揶揄陶云逵，如果论诗画音乐等艺术，除了跳舞，其他方面陶云逵都能成名家，何苦到这荒蛮之地来做这种艰苦的社会科学的学问？^{〔2〕}陶云逵只回答说，他不愿意和父亲一样。费孝通因此说，陶云逵内心有坚定的学术理想和对这种理想的真诚信仰，去“向他的遗传争斗”。只是这种坚持也未必不是他的艺术家父亲遗传的精神，毕竟为艺术的琢磨与为学问的琢磨

〔1〕 李宝凯：《毗陵画徵录》，常州振群印刷公司铅印本，1933。

〔2〕 费孝通：《物伤其类——哀云逵》，见《费孝通文集》第三卷，14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1944〕。

本质都是同一个道理。因现存资料所限，已很难确知陶云逵从父亲那里获得哪些学识教育，但是他对父亲的感情却非常深，以至1927年父亲亡故给了他重大打击，不久其母亦歿，他伤心之余便选择去国离乡，到陌生的国度求学以平复心情。^{〔1〕}

陶云逵的中学时代是在南开中学度过的，大约为1920年代初。少年的他广额浓眉，目光炯炯，对上自宇宙人生，下至修辞造句充满了兴趣。^{〔2〕}1922年，罗常培到南开中学代课，任国文教师，便注意到了这位少年。当时罗常培本人在北大哲学系读二年级，这位后来的语言大师此时不过二十出头，自述“治学方法上颇受实验逻辑‘思维术’的影响，在人生哲学上很被（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所倾倒。对于形而上学和纯唯心论反倒不大感觉兴趣”^{〔3〕}。罗常培代课时间不长，但是和陶云逵相谈甚欢，结下了初步的友谊。两人仅相差六岁，一位是少年早熟，一位是“五四”青年，学问上的讨论无从谈起，只是对时代都共同有了朦胧又热切的激情。罗常培就回忆到，当时南开中学对教学的思想内容检查很严，国文课的教材大都选诸如黄梨洲的《原君》、邓牧《伯牙琴》里的君道臣道等较保守的政论，他自己偷偷选了一篇李大钊的《今》，很快就被教务主任来“检查思想”。^{〔4〕}可想而知，在这种氛围下，与罗常培的结识给陶云逵带来思想的新鲜感和刺激感，也促使他开始对新知识有向往。

1924—1927年，陶云逵到南开大学念书，读的是矿冶专业^{〔5〕}，

〔1〕 梁吉生：《陶云逵献身边疆人文研究的一生》，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380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 罗常培：《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载《边疆人文》第一卷第三、四期，1944，3页。

〔3〕 罗常培：《自传》，见北京语言学会编《罗常培纪念论文集》，411—4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同上书，412页。

〔5〕 徐益棠：“徐序”，见陶云逵：《车里摆夷之生命环》，见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20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1948〕。

听过李济的课，并得他指点，开始接触人类学。^{〔1〕}当时南开大学刚成立不久，校长张伯苓在海内外四处延揽人才，延请了一批青年学者来讲授社会科学和哲学，诸如陶孟和、汤用彤、李济等，他们大部分都有留学背景。^{〔2〕}李济在南开大学开设了人类学、社会学和统计学课程；其中人类学含考古学的内容，在中国乃是第一次讲授，1925年又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但清华学生对他的课程反响普遍颇冷淡。^{〔3〕}在南开，情况很可能也差不多，因为李济后来在清华只有“一个半”弟子，“一个”是吴金鼎，“半个”是徐中舒^{〔4〕}；而南开大学则没有。陶云逵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对李济的课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后来他赴德学习人类学，离不开李济的这个“启蒙”。^{〔5〕}再到后来陶云逵从国外学成归国，将他引介给国内学术界的人，也是李济。

正如岱峻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李济在南开时期留下的最大影响，就是把地质学的一套田野工作观念和方法进一步在国内推广，也即运用李提摩太“土层犹书叶”的观点发展来的层位学理论挖掘历史遗迹^{〔6〕}；这个历史遗迹既是指地下的考古证据，又是指文字记录。李济在1923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里已经初步展现了这方面的尝试。他从体质、城市和姓氏的分布来考察人群共同体的移动、混合情况。陶云逵从体质转向文化的时候一开始便借鉴了李济的研究。但是后来的田野工作使他很快又有别于李济，亦有别于傅斯年——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讨论。

〔1〕 梁吉生：《陶云逵献身边疆人文研究的一生》，见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379页。

〔2〕 同上。

〔3〕 岱峻：《李济传》，4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4〕 同上。

〔5〕 同上书，27页。

〔6〕 同上书，28页。